

忆当年

背景:1953年,中共中央通过《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》,对粮食等农作物全面实行统购统销。1955年8月,《关于市镇粮食定量供应暂行办法》发布,要求实行统购统销的市镇,对非农业人口一律按劳动差别、年龄大小进行居民口粮分等定量供应,全国通用粮票开始发行,“计划吃饭”的时代到来。

讲述者:周爱莲,59岁,湘电集团(原湘潭电机厂)退休人员

“咯喉咙”的红薯饭

本报记者 冯叶

1970年,岳塘区下摄司街道工人村的周家将家里唯一的大方桌换成了小方桌。毕竟,8岁的周爱莲和6岁的妹妹不能再与哥哥同睡,父母需要在总共15平方米的家架多架一张床,只好委屈了吃饭的方桌。

这张边长半米的小方桌,四周挤着一家七口,饭桌上倒是空爽,只摆着两个菜碗,还都是素菜。饭呢,每人每餐限量一小碗。准确说,是半小碗,剩余半碗是被榨干了淀粉的红薯丝。在那个物资极度匮乏的年代,这碗珍贵的红薯饭,仍然是“难以下咽”的。用周爱莲的话讲,叫“咯喉咙”。

但是再难下咽,饿久了的周爱莲还是会将它吃得干干净净,即使不小心将饭掉到桌上,也要捡起来吃掉;遇到一粒谷,也要停下筷子,剥开来,吃里面未熟的生米。因为哪怕浪费一粒米,也是要挨打的。

在那个年代,每一粒米,都来得太不容易。新中国成立初期,物资匮乏,粮食无法做到敞开供应。1953年,中央政府决定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。1955年,粮食等票证铺天盖地进入社会,人们的衣食住行全靠钱还不行,吃饭得有粮票,买布做衣得有布票,用一分钱买一盒火柴得有火柴票,孩子要是想吃口糖,还得分得有糖票。而糖票,通常只会分给有痼疾病人的家庭。

但有钱又有票,也不见得就能换回物资。粮站、蔬菜店、豆腐店……但凡与吃有关的店铺前,天天都排起长龙。

已经8岁的周爱莲常被父母打发去排队。大热天里,她打着赤脚跑得飞快,一来是家里买不起鞋,路面烫脚;二来是去慢了,就有可能“排两个小时空手而归”。如果是买热豆腐,就得早晨五六点去排队,因为便宜,买的人最多,小个子的周爱莲常挤在队伍里,被“热豆腐浇头”。

粮食排到了,拿回家,还得有一次家庭内部的分配。一个月的口粮是早就计划好的,每天吃多少、每人吃多少,都是定量的,而家里在外干体力活的人,会分得多一些。这意味着,在家里待着的人就得省一些:晚饭后,已经黑掉的锅巴也不能扔,加些菜叶,兑水一煮,就是第二天全家人的早饭。

为什么自己得省着、留给身强力壮的哥哥?周爱莲本不明白,直到一次她去哥哥下放的农场看他

周爱莲在田埂上遇到一名“老农”,上前问路,对方闻讯抬头,她才发现,这位皮肤黝黑、穿着又脏又破的工装、戴着旧草帽的“老农”竟是自己的哥哥。到了中午,她才知道,原来哥哥一直吃的是没放油的南瓜,不比“咯喉咙”的红薯饭强。后来,为了能吃上一点油水,哥哥和几个室友约定,以两月为期,轮流从家里带油过来,靠“粮油互助”熬过了那几年。

这种节衣缩食的日子,持续了好多年;这种互助的传统,也延续了好多年。1982年,周爱莲从技校毕业,被分配到湘潭电机厂。这里每个班组都有一个互助会,每名班组成员每月都会拿出少量钱和粮票放在互助会公用,谁家临时遇上困难了,可到互助会借钱借票,往后再逐月归还,无需支付任何利息。

每到傍晚,住在连排平房的职工们,都会端着饭碗挨家挨户串门。虽然每家的饭菜都有限,但每家腌菜各有滋味,每家欢笑也各有不同。晚饭后,大人们搬出凉席,排坐在坪里打蒲扇,孩子们围在膝下,缠着老人们讲故事。

到如今,粮票早已退出历史舞台,吃饱饭、吃好吃,已成为日常。但家里人下馆子时,偶尔也会“忆苦思甜”,点上一锅红薯饭,孩子们吃在嘴里,是软的、香的、甜的,只是周爱莲和她的同辈人,仍然对此“难以下咽”。为什么呢?周爱莲说不上来,那些话语、那些故事,都堵在嗓子眼“咯喉咙”。她既难过,又开心——

她童年时吃的那碗“红薯饭”,她的女儿和外孙女,没有尝过,也再无需尝了。



一粒米，记一辈子

编者按:

“杂交水稻之父”、“共和国勋章”获得者、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,于5月22日13时07分在长沙逝世,享年91岁。连日来,人们都沉浸在悲痛中,用自己的方式缅怀袁隆平。

这位伟大的老人,我们大多数人不曾谋面。他的离开为何让我们如此悲伤?或许是因为一个最朴素不过的道理——民以食为天。

在岁月的长河中,中国人民经历了从“没饭吃”“吃饱饭”到“吃好吃”的巨变,尤其是老一辈人,对“粮食”的感情尤为深刻。今天,我们采访了几位湘潭人,听一听他们“一粒米,记一辈子”的人生故事。

背景:1976年,三系杂交稻在全国推广228万亩,这是我国水稻育种的一个重大突破。1981年,国务院将“国家技术发明特等奖”授予以袁隆平为代表的籼型杂交水稻科研协作组。1984年,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成立,成为国内外第一家杂交水稻专业科研机构。从此开始,全面种植“杂交水稻”的时代来临。

讲述者:邹启良,54岁,韶山市杨林乡种粮大户

“杂交水稻改变了我的一生”

本报记者 王希台

5月28日,1989年出生的邹海蛟带着妻儿和他种植的“三基”大米,参加了在湖南农机产业园湘潭国际会展中心举办的“湘潭好米”评选活动,他连煮了几锅米饭,好让大家尝个够,吃个饱。

这样的情景放在以前,是邹海蛟的父辈们想都不敢想的。

1975年,邹海蛟的父亲邹启良8岁,因为还有3个兄弟姐妹,吃不饱是常有的事。

今年54岁的邹启良清楚地记得,那年过年,因为饿得慌,他和几个孩子跑到山上去挖“土茯苓”充饥。“好不容易挖到一个土茯苓,还要抢,慢了就吃不到了。”邹启良说,那时候从没想过,这辈子能吃饱饭。

长大后,家里有了两亩田,邹启良选择老实实在家种田,不为别的,就为了能有口饭吃。

1989年,22岁的邹启良结婚了,并于当年生下了儿子邹海蛟,他开始独自挑起家庭的重担,养活妻儿。“之前我种的是普通水稻,不管怎么努力,产量总在350公斤左右。”邹启良说,上世纪80年代杂交水稻就有了,但在杨林乡还没有推广,还有部分人不接受。

从1993年开始,邹启良开始种植杂交水稻,以后逐年增加种植面积,产量也是一年比一年高。“起初亩产是400公斤,后来是500公斤,现在管理得好能到700公斤。”邹启良说,为了多产粮食、多出效益,他开始租赁其他农户的田,扩大自己的种植规模。

当大多数人选择外出打工时,邹启良却选择继续在老家种田。

邹启良还是杨林乡第一个“吃螃蟹”的人,他流转了农村闲置的田地,购买现代农机,逐年增加种植面积,成了当地的种粮大户。

“农业科学技术改变了我们农民的命运,老老实实在种田也能过上小康生活。”邹启良说,2015年他创办了韶山市起良种植专业合作社,当年就流转土地219亩,种植杂交水稻,实现亩产水稻550公斤,让78户农户每亩增收400元。

从2015年开始,邹启良开始大规模种植杂交水稻,种植面积也从最初的200多亩增加到600亩,再到现在的3000亩,“杂交水稻改变了我的一生。”他说,“不仅让我实现了吃饱饭的梦想,还让我走上了致富路。”

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。为了满足种植的需要,邹启良还成立了韶山市裕农现代农业合作社。为形成规模效益,他又与3家农民专业合作社一起注册成立了韶山市三基农业开发有限公司,流转耕地近4000亩,主要从事优质杂交水稻种植、食用菌栽培和销售、农机社会化服务等。

“从没想过这辈子能吃饱饭,还能种这么多田,这都要感谢党和政府,感谢袁隆平院士,是他们让农民过上了好日子。”邹启良说,如今,响应乡村振兴的号召,退伍回来的儿子邹海蛟接过了他的“接力棒”。他相信,希望的田野上,杂交水稻的稻穗会更沉、更沉。



(图片均翻拍自《湘潭老照片》)

背景:1993年2月18日,《国务院关于加快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通知》发布,要求积极稳妥地放开粮食价格和经营,实行了40年的城镇居民粮食供应制度(即统购统销制度)终止。

讲述者:刘萍,59岁,岳塘区板塘铺原粮店员工

“过气”的早稻米

本报记者 郑懿慧子

“啪!啪!”2004年的夏天,每隔半个小时,刘萍都会用舀米瓢一次次接满水,将粮店的前坪泼湿,以获得更多的凉爽。

舀米瓢“不务正业”是常态。

粮店里有十多种米,分别用米盒装着,整整齐齐排成两列。顾客进店后,往往只是往米盒里轻轻抓起一把,瞧上一眼,再搓两下,就已经决定好要采购的大米种类,无需刘萍用舀米瓢舀出,顾客一般会直接扛走已精装好的袋装大米。唯有顾客想要买早稻米时,舀米瓢能干上本职工作——刘萍会拿出准备好的塑料袋,按顾客要的量,舀多少称多少。因为早稻米少有人问津,且常是散买散卖,装着它的米盒常年被安排在粮店的角落里。

但在上世纪70年代,刘萍却为了能多买一些早稻米,吃过不少苦头。

当时,人们按粮食指标买米吃饭,因为缺少肉、禽、蛋、油等,饮食清汤寡水,人的饭量就大。刘萍清楚地记得,自己一家5口一天最少要吃3.5公斤米。

粮店内米的品种也有限,只有“特一”和“特二”两种。“特一”是早稻米,“特二”是晚稻米。早稻米生长期短,米质疏松、质干硬,口感差,但比晚稻米吸水率大、黏性小,也就是老人们常说的“更发饭”。晚稻米的生长期较长,吃起来质地细腻、黏稠适中,比早稻米松软可口。

虽然人们知道早稻米口感不及晚稻米好,但因为同样重量的早稻米比晚稻米煮出的饭要多些,能让人吃得更饱,大家都争着抢着买早稻米。一旦粮店到货早稻米,买米的队伍就会排得老长。

作为长女,刘萍的主要任务就是买米。为了买到早稻米,每次家里粮食所剩不多时,刘萍就会跑到粮站,悄悄向店员打听何时会有早稻米到货,然后数着日子去购买,紧接着安排好家里的口粮。等到到货当天,她4点钟就要起床,抱着自制米袋去排队,可粮店外早已排成长龙。

好不容易等到8点,粮店开门,大家突然紧张起来,唯恐有人插队,紧挨在一起。一瓢过钱后,店员拿大铁瓢从大米包中一瓢一瓢地舀出来,倒入簸箕里过秤,称好秤后交给买米人。十一二岁的刘萍,除了双手得拉着袋子,还得用牙咬住一侧,让袋子形成三角形,簸箕内的米才能顺畅地倒入。大米入袋时,一股“米灰”扑面而来,刘萍总是被迷了眼。等到米装满,她已是眼泪巴巴。

1982年,农村确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,加上杂交水稻技术的不断推广,粮食产量大大增加,大家再不必为饿肚子担心,这种排队买早稻米的现象就慢慢少了,而口感较好的晚稻米自然越来越吃香。

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,人们的生活水平逐渐提高,副食品不断丰富,大家的饭量比以前明显减少。加上市场的开放,私营粮油店应运而生,人们的选择也变多。以前那种用麻袋装的100公斤一包的大米很难见到了,大米的包装改成10公斤、5公斤,后来甚至有了1公斤的真空包装,便于携带。漂亮的包装上印有品牌、产地、厂名、出厂日期,由顾客任意挑选。到了近几年,商家还能送米上门。

正是在这个阶段,刘萍也成了私营粮店的一员。此时,大米的品种更多了,有来自北方的东北、五常、延边大米,也有来自南方的金健、福临门、苏垦大米,还有进口的泰国香米,令人目不暇接。刘萍也成了“大米专家”,每一种大米的特性她都如数家珍。

最近几年,“过气”的早稻米又开始回归人们的视线。已经退休的刘萍偶尔也会为了患有糖尿病的老伴,去粮店里买一两斤早稻米。也只有这个时刻,刘萍才会想起,那被扑满一脸的、早稻米“米灰”的味道。